

中国工人运动史 研究文集

中国工运学院
工人运动历史研究所 编

中国工人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大钢

ISBN 7-5008-2392-4



9 787500 823926 >

定价：38.20元

中国工人运动史 研究文集

中国工运学院 编
工人运动历史研究所

主编：曹延平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0.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文集/中国工运学院编. -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0

ISBN 7-5008-2392-4

I. 中… II. 中… III. 工人运动-历史-研究-
中国-文集 IV. K261.3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9359 号

-
-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鼓楼外大街)
- 印刷: 北京崇义宝杰印刷厂
-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 版次: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 字数: 398 千字
- 印张: 15.875
- 印数: 1~1000 册
- 定价: 38.20 元

前 言

20 世纪就要过去了，人类历史即将翻开新的一页。在过去的 100 年里，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英勇奋斗，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改造、建设成为一个初步繁荣富强，正在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奋勇迈进的国家。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中国工人阶级作出了卓越贡献。为了纪念中国工人阶级在过去 100 年里所作出的伟大贡献，表达对中国工人阶级和无数先辈们的由衷敬意，我们选编了这本文集。

本集共收录了 50 余篇文章，分为“工运春秋”、“人物研究”、“组织史迹”、“史实考证”、“研究述评”等五个专题。它们从不同的角度，记述和分析了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重大事件、代表人物、组织机构和研究现状。作者大部分是中国工运学院正在从事工运史教学、科研工作一线的中青年教研人员。作品主要为近十年来散见于各种报刊，特别是工会内部刊物上的文章，部分是首次公开发表。由于篇幅所限，书中未能尽收长期以来中国工运学院有关中国工人运动史的全部文章，更不能反映整个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的全貌，对此我们深感遗憾。

本书对文章的筛选基本尊重了作者本人的意愿，同时，考虑到全书的编辑需要也作了一定的取舍；除对个别标题作了适当修改外，基本保持了文章原貌；各专题中文章的排列，以所反映的时期先后为序。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文章的编排和分类不尽合理，疏谬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至于文章对人物的评价、史实引证以及观点正确与否等，均由文章作者本人负责。

本书能够付梓出版，包含了全室同仁的辛勤努力，也得到了中国工运学院领导、院科研处、《工会理论及实践》及《工运参考资料》编辑部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与协助，尤其是中国工人出版社给予了鼎力相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编者

2000年5月

目 录

工运春秋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手工业工人的状况和

- 斗争 王永玺 (1)
- 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及早期特点 樊济贤 (15)
-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工会关系的历史回顾 ... 何钢 曹延平 (27)
- 1949 年以前中国工会立法活动述略 王玉平 (40)
- 初期红色工会国际与中国工人运动及建党的
- 关系 杜万启 (57)
- 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开始结合的标志 ... 高爱娣 (69)
- 论中国共产党领导第一次工运高潮的功绩、经验和
- 意义 王永玺 (83)
- “二七”斗争失败的原因初探 高爱娣 (93)
- 我国工会兴办经济事业的最初尝试 谢安邦 (104)
- 革命根据地工会工作方针的历史演变 曹延平 (111)
- 苏维埃劳动法的历史回顾 高爱娣 (116)
- 根据地的工会整风运动 高爱娣 (123)
- 试论抗日战争时期工人运动统一战线 曹延平 (129)
- 赵占魁运动的作用及其经验 谢安邦 (156)
- 评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对《工会法》的两次修
- 正公布 谢安邦 (163)
- 新中国工会五十年评述 王永玺 何布峰 (175)

建国初期关于工会问题的分歧与争论	樊济贤 (196)
试析全总党组第二次扩大会议	曹延平 (204)
全总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述评	何布峰 (219)
“文化大革命”中全国总工会停止活动的前后	
后后	何布峰 (229)
学习贯彻毛泽东关于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指导	
思想, 充分发挥工会的桥梁、纽带作用	谢安邦 (234)
台湾劳工问题初探	佟建寅 (241)
略论台湾近代工人运动	佟建寅 (248)

人物研究

毛泽东关于抗日根据地工人运动与工会工作的言论

述评	高爱娣 (254)
试论毛泽东与新中国工人阶级和工会	何布峰 (260)
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和理论家——刘少奇	马子富 (272)
民主革命时期刘少奇工运思想发展轨迹	王玉平 (277)
建国前后刘少奇工运思想探析	高爱娣 (288)
试论刘少奇建国以来工运思想产生及发展变化的	
历史条件	何布峰 (302)
浅析刘少奇、邓小平关于新中国工会理论的奠基和	
发展	王永玺 (307)
试论邓小平新时期工运思想	杜万启 (321)
学习李立三关于加强工会内部的民主制度建设的	
思想	马子富 (330)
李立三关于处理劳资纠纷的思想	高爱娣 (336)
李立三对新中国劳动立法的贡献	杜万启 (343)
建国前后李立三在发展和壮大工会组织方面的重要	

作用	樊济贤 (349)
李立三在新中国建立前后对工会组织建设的 贡献	齐燕庆 (357)
赖若愚的群众监督思想研究	高爱娣 (365)
浅析李立三、赖若愚工会理论的同和异	王永玺 (375)
刘长胜在上海的工运活动	高爱娣 (387)
刘宁一在上海的工运活动	关素贤 (396)
援助中国工人运动的日本友人铃江言一	王玉平 (402)
新发现的铃江言一三篇佚文	王玉平 (406)

组织史迹

五卅运动中上海总工会组织发展述略	王玉平 (418)
关于中国劳动协会的几个问题	吴亚萍 (427)

史实考证

关于我国第一部工会法的产生、内容与评价	王玉平 (439)
再说我国的第一部工会法	王玉平 (445)
上海总工会成立于“五卅”运动之前	王玉平 (450)

研究述评

日苏等国对中国工人阶级与工人运动的研究	王玉平 (454)
二七斗争史研究述评	关素贤 (468)
新中国前 40 年工运文献史料的整理和利用	关素贤 (478)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 手工业工人的状况和斗争

王永玺

中国工人阶级产生、形成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而现代工会运动则兴起于更晚一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的时候。但是它们的前身和原始形式，却早已随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而出现了。为了参查与了解中国工人阶级和工会运动的历史渊源和民族传统，本文追根溯源，粗略地考查一下明、清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与缓慢发展时期，手工工场、作坊中手工业工人的悲惨处境，以及他们的斗争和组织状况。

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和发展于封建社会晚期。大多数史学家认为，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大约到了明朝中后期（公元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初），在一些经济发展发达地区的某些手工业生产部门中，开始产生了资本主义的幼芽。例如明朝万历年间，吏部尚书张翰在《松窗梦语》卷6《异闻纪》中叙述其祖父在成化末年经营丝织业发家的情况：嘉靖年间，吴江县盛泽镇有个叫施复的人，“家中开张绉机，每年养几筐蚕儿，妻络夫织”，由于“蚕种拣得好”，“缫下丝来，细员匀紧，洁净光莹”，“织下的绉拿上市去，人看时光彩润泽，都增价竞买，比往常每匹平添稍多银子”。“几年间，就增上三四张绉机，家中颇饶裕。”“不上十年，就长有数千金家事。又买了左近一所大房居住，开起三

四十张绉机。”^① 上述施家的发迹史，就是由丝织业中小商品生产者逐渐变为手工业工场主的典型事例。在这类手工场中，使用了雇工生产，即“机户出资，机工出力”，机户占有生产资料，剥削机工的剩余劳动，是最早的资本家；机工靠出卖劳动力为生，他们“得业则生，失业则死”，又都“计日受值”，是早期雇佣工人。明末，苏、杭一带丝织业雇佣关系在原有基础上又有进一步发展。已有不少有专门技术的手工业工人，在固定地点等待雇佣，如苏州“东城之民多习机业，机户名隶官籍。佣工之人，计日受值，各有常主。其无常主者，黎明立桥以待唤。缎工立花桥，纱工立广化寺桥。又有以车纺丝者曰车匠，立濂溪坊，什百为群，粥后始散。”^② 由此可知，当时全国丝织业中心苏州的手工业工场和雇佣工人队伍已有相当的规模。

明朝中期，当手工业出现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的同时，商人成为包买主，控制手工业生产的情况也开始出现。这时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资本的活跃，全国各地尤其江南地区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商人集团，如徽商、闽商、粤商、吴越商等。他们在各地设立会馆，组织商帮，其中有拥资数万、数十万甚至数百万的大商人。他们有的开始从小手工业者那里收购产品，另一方面又将原料、资金和生产工具贷给小手工业者，控制其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在一些纺织业集中的地区，纺织品交易控制在牙行之手，“大户”的产品由牙行引客商去包买，“小户”产品则送到牙行去出售。牙行和收丝客商都是包买主。在全国棉纺织业最发达的松江，“农暇之时，所出布匹，日以万计”，“纺织不止乡落，虽城市依然，里媪抱纱入市，易木棉以归，明日复抱纱以

① 冯梦龙：《醒世恒言》第359—371页。

②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卷1、第214页。

出，无顷刻闲，织者率日成一匹，有通宵不寐者。”^①可见包买主不但控制了小生产的产品，而且以棉易布，控制了小生产的原料，具有了明显的商业资本倾向。

与此同时，在瓷器生产中心景德镇，据史料记载：“天下窑器所聚，其民繁富，甲于一省”；“万杆之声殷地，火光烛天，夜令人不能寝，”^②其生产的规模、繁荣的程度已十分可观。除官窑外民窑不断兴起，雇工纷至沓来。“四方远近，挟其技能以食力者，莫不趋之如鹜”，^③出现了“工匠来四方，器成天下走”的商品生产盛况。此外，在矿山、采煤等手工生产领域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某些因素。

清朝建立以后，经过康雍乾盛世，随着整个经济特别是手工业的恢复和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又有所增长。

首先，在丝织、造纸、瓷业、制盐和采矿等行业中，具有资本主义因素的手工作坊和工场数目增多，规模扩大。据统计，这期间，南京丝织工场织机共有5万台左右；苏州约有3至4千台。当时手工工场内部分工极为细密。如苏州染纸业有刷、托、洒、推、插、拖、表等各种工序，并有适合各种工序掌握专门技艺的工匠。雇主与雇工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机户出资”，“机匠计工受值”^④，并“视货之高下，人工之巧拙为增减”^⑤，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有的行业雇主与雇工“并无主仆之分”，雇工可以随时“辞工不做”，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已不复存在。

其次，这期间，包买商的活动范围和发展程度也远远超过明

① 《古今图书集成·方輿汇编、职方典》卷690。

② 王世懋：《二酉委潭摘录》、《纪录汇编》卷206。

③ 《景德镇陶录》卷8，引谢旻《外记》。

④ 《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6页。

⑤ 顾振涛：《吴门表隐》卷1。

朝。在江南地区的丝织业中出现了一些大的“帐房”。“大帐房”不但自己拥有手工工场“设机督织”；而且还控制了许多分散的小作坊，使其成为“大帐房”手工工场的场外部分。“大帐房”通过预付原料，借贷，供应生产工具等方式控制小生产或小作坊，最后“按绸匹计工资”。与此同时，广东糖商“春以蔗本分与种蔗之农，冬而收糖利，开糖坊者多以致富，”景德镇制瓷业中，也出现商人先买来原料，分给各窑户，订立定货、收购合同，到期由商人雇定庄头，挑收纺户瓷器。包买商就这样通过借贷、预付原料、供应生产工具等方式把小生产控制在手，把商业钱财逐步转化为手工业资本。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地表明，从明朝中期至清代鸦片战争前，资本主义萌芽确实产生了，并在缓慢地发展。但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和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基础在整个社会中仍占绝对支配地位；同时明、清两代继承以前封建王朝的“强本抑末”政策，闭关锁国，摧残贸易；加以封建行会的羁绊等，都严重窒息、阻碍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使其发展呈现时而活跃、忽又停滞的曲折、缓进状态。

二、手工业工人的人数、斗争和组织

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后，从全过程及总趋势看，其发展是艰难、迟缓的。但从明朝的万历至清代的道光期间，它毕竟产生了，并在清朝的前、中期有过较快的发展。因此，在这时期，在经济发达的城市及地区，手工业工人人数迅速增长，加上破产农民的蜂拥流入，苦力和游民队伍的扩大，他们和手工业工人自然结合在一起，逐渐形成一支颇具规模和影响的社会力量。

第一，关于手工业工人的人数。据史料记载：明朝时的苏州“东北半城皆居机户”，到万历时，“机户罢而职工散者幼数千

人”。^① 杭州城东平安里，“一乡之人织绫锦为业。”^② 据估算，明末江南民间机户所雇的工匠约 3 万人。^③ 在制瓷业最集中的景德镇，据万历年间的肖近高说：“镇上佣工，皆聚四方无藉游民，每日不下数万人。”^④ 在冶铁、采煤业方面，有的商人“租赁他人之山”，挟资百万，佣人冶铁而致富。这些场矿雇人有的多达数千人。山西大煤矿，采煤工之多，以致“黧面短衣之人填街塞路，”而且“有产煤之地，有锻煤之人，有运煤之夫，有烧煤之家。”^⑤ 这说明早在明朝中后期，经济发达地区和矿山集中的手工业工人及苦力的数目已相当可观。到清代，因商品经济比明时有较快发展，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在地区与行业方面有了新进展，封建人身依附关系有明显松动和削弱。因此，雇佣劳动已被手工作坊、工场广泛采用，手工业工人又有了迅速的增加，而且绝大多数来源于农镇。据记载：棉纺业，1730 年，仅苏州 45 家棉染踹布坊、雇工 1.9 万人；1833 年，广东佛山镇，有织布工场 2500 家，雇工 5 万人；制瓷业，1743 年，江西景德镇，有纺 300 至 400 座，雇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万人；制茶业，1833 年，福建瓯宁县，有 1000 个场坊，雇工约万人，加以客贩、担夫，合计又数千人；^⑥ 等等。以上手工业雇工人数的记载，有的可能言过其实，但不容否认，清代手工业雇佣劳动者较明代有了普遍的增长。

第二，关于手工业工人的斗争。面对资本主义萌芽成长和手工业工人队伍的扩大，自明中叶以来至清初，封建统治者对其采

① 明《神宗实录》，卷 361、380。

② 姚震：《东城记余》，卷上，第 30 页。

③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 1 卷，第 149 页。

④ 肖近高：《参内监疏》，光绪《江西通志》，卷 49。

⑤ 明《神宗实录》，卷 361、380。

⑥ 刘永成：《论清代雇佣劳动》，1962 年第 4 期《历史研究》。

取一系列约束、限制和打击的政策、措施。例如，明朝万历年间，实行了限制、摧残民间开矿的“税监政策”。神宗皇帝陆续派出大批宦官，充当矿监、税监。他们所到之处以征税、开矿为名，设立关卡，横征暴敛，造成“矿不必穴，而税不必商”，“窗乡辟坞、米、盐、鸡、矢、皆令输税”。^① 有更甚者，他们不仅疯狂掠夺工商业主，而且骚扰和蹂躏工匠和市民。“其党直入民家，奸淫妇女，或掠入税监署中”，从而激起城镇手工业工人及市民的公愤。据不完全统计，从万历到天启年间，共爆发大规模的反税监斗争 20 多起，地区遍及大江南北经济发达地区的著名城镇。1599 年，荆州商民一呼而聚者数千人，抛掷瓦、石，驱赶税监陈奉逃出荆州。同年山东临清爆发了以王朝佐为首的工匠、脚夫、商人、市民万余人，反抗税监马堂的斗争。他们火烧监署，击毙其爪牙 37 人；当明政府派兵镇压，搜捕“首恶”时，王朝佐挺身而出，“以身任之，临刑，神色不变。”^② 1603 年，由于税监王朝的暴虐，就在明朝皇帝的眼皮下，京西煤窑的业主和矿工也集合队伍，跑到京城游行、示威，致使“黧面短衣之人，填街塞路，持揭呼冤”，^③ 从而引起神宗及大臣们的震惊和忧虑。由于全国各地城市反税监斗争此起彼伏、愈演愈烈，最后终于迫使明朝政府撤回全部税监、矿监。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斗争中，手工业工人是主力军，起了重要作用，并表现了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和良好的组织、纪律性。这次以手工业工人为主力，包括中小商人和作坊主在内，反封建压迫的城镇市民斗争，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它是资本主义萌芽在政治上的反映。

到了清初，封建统治者除继承明王朝施行“强本抑末”、“殴

① 《明史》，卷 81，《食货志》。

② 赵翼：《廿二史记》卷 35，《万历中矿税之害》。

③ 明《神宗实录》，卷 361；卷 380。

民入农”压制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外，还常以政治特权甚至武力来限制、禁止民间开矿，限制对外贸易，限制机户织机的数目，以及签派机户充当堂长管事的繁重徭役等。对于广大手工业工人、苦力、矿夫，清朝当局又与封建行会及作坊主相互勾结，实行极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这期间，城镇市民反封建压迫和手工业工人与工场主、作坊主的斗争，分两个层次进行，有时也交织在一起。其一，是手工业工人和工商业主联合与封建官府斗争。顺治年间，山西潞安的绸行机户为反对签派而“焚机罢市”；^①康熙年间，江宁、镇江、扬州商民罢市，拒绝新任督机，要求承免税额；^②雍正年间，奚贵卿组织工匠反抗官府、几乎暴动^③在频繁的市民与工匠的骚动及强烈抗议下，清政府被迫让步：减轻工商赋税；“听民自开矿业；废除“丝机不得逾百张的限令”；雍正时还一度宣布开放海禁等，使封建压迫有所减轻。其二，是手工业工人反对封建压迫和手工场主剥削的斗争。清朝前中期，随着市场的扩大、自由竞争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于是作坊主与工匠之间的矛盾、斗争也日益激烈，这在苏州一些手工业中最具有代表性。据现存碑刻中的资料，斗争主要集中在踹布、丝织、染纸、印书等行业中。这些行业管理方式上极为野蛮、落后。工匠遭到雇主，把头和官府的联合压迫及奴役。如康熙四十年（1701）立《苏州府约束踹匠碑》，规定：“在苏踹匠，具听（长州、吴）两县典吏协同城守营，委员督率，包头约束”，“不许夜行生事、酗酒赌博及倡优、停踹歇工行诈，并将包头编甲，互相稽察”，“一家有事，九家连坐”。^④如此对手工踹

① 乾隆：《潞安府志》。

② 邓拓：《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与历史意义》，《人民日报》，1955年1月9日。

③ 清：《雍正硃批谕旨》。

④ 苏州历史博物馆等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1981年版，第64至70页。

匠，有如工奴、囚徒。对其它工匠虽未如此严厉，但人身自由也非常有限。在经济上，这期间，各业作坊主或手工场主，好加紧对工匠及学徒的剥削，几乎普遍实行了马克思所称的“血汗制度”，而且“是最适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①计件工资制度。再加上清初从康熙至乾隆米价上涨。康熙中期，苏州府的米每石值银4钱，至乾隆初年米每石高至1.5两白银，上涨了1.75倍。而踹匠的工价银，在康熙时每匹一分一厘三毫，至乾隆初年这个基数仍未改变。米价暴增而工价照旧，势必使手工业工人的实际工资减少，生活不降。一方面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成长，手工业工人队伍有了扩大，另一方面，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又受如此残酷的压迫与剥削，于是清代前中期手工业工人的自发斗争日趋频繁、激烈，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持续之久，都超过了明末。据不完全统计，从康熙至道光，仅苏州就爆发了16次较大的罢工斗争，波及棉织踹房、丝织、造纸、蜡烛、金箔、印书和屠宰等行业。在这些罢工斗争中，手工业工人不但传单约会，组建团体，而且可使同业工人响应罢工，开创同盟罢工的先河，形成了相当的规模与声势。如苏州踹坊工人在康熙九年（1670），有窦桂甫倡言年荒米贵，传单约会众匠停踹，索添工银，“王明洁不肯附会，辄罚令唱戏酬神，以致余人皆停工观望”。^②康熙四十年（1701），苏州踹匠再次爆发罢工，其规模之盛、斗争之烈更属罕见。他们罢工号令一出，“千百踹匠景从，成群结队，抄打竟无虚日、以致包头畏避，各坊束手，莫敢有动工开踹者”。此外，这期间，如景德镇的制瓷业，广东的矿徒、炉丁、陕南的伐木工，甚至隶属户部宝泉局官办铸钱厂的工匠等，也都为反抗压迫和工银、工食问题，开展不同规模的斗争，

① 《理论战线》，1959年第12期。

② 《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33页。